抗战史书写的昨天和今天

□钱念孙

一

近期，与国内纪念抗战的氛围相一致，学术界与出版界也先后推出一批新的抗战出版物。简略归纳，这些出版物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力图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抗日战争历史的，如张宪文著《中国抗日战争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步平著《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全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年），以及王树增的纪实文学作品《抗日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等。其二、侧重探寻以往抗战史忽略的重要部分，描绘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壮阔图景，如张洪涛著《国殇——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团结出版社，2012年）、陈钦著《我的河山——抗日正面战场全纪实》（中信出版社，2013年），以及周渝编著的《为国岁月：国民革命军抗战将士寻访录》（团结出版社，2014年）等。其三、从日本及西方发掘长期埋没的史料，揭秘抗战中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实，如萨苏著《国破山河在——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英〕米特著，蒋永强、陈心心译《中国，被遗忘的西方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战争全史》（新世界出版社，2014）等。其四、通过抗战亲历者的讲述，再现抗战的悲壮历史和苦难细节，如梅世雄著《与鬼子玩命：抗日将士“口述历史”》（新华出版社，2009年）、崔永元等著《我的抗战——300位亲历者口述历史》（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以及各类抗战经历者的回忆录等。

这些著作都试图揭开被历史迷雾遮蔽的史实真相，都摸索从更多方面挖掘抗战资料和感人故事，从而达到较为完整、较为客观地呈现抗战本来面貌的目的。此类著述的产生，既表明我们的抗战史研究在范围拓展和内容深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令人瞩目的突破，也昭示我们党和国家在处理涉及自身历史敏感问题时，有了较为开明的态度和更为宽广的胸怀。

二

我们目前对抗战史的研究和认识还远远不够，尚有不少有待改进、有待完善之处。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除了要隆重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也要秉持中华史学“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优秀传统，对抗战史中的诸多重大问题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对如何搜集、辨析、整理抗战史料采取正确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

就对重大问题的历史定位而言，无法绕开的首要话题当然是如何对抗战中两个最大的政治力量，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发挥作用的认识和评价问题。八年抗战是在两个战场上展开的，主要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主要由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配合，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御日本侵略，从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对共产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相对谈得较多，经常用“中流砥柱”来形容和概括。从抵制国民党一度消极抗日，到推动建立并长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在严酷的敌后战场开辟广褒的抗日根据地，到八路军、新四军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大量敌人，共产党在抗战中确实做出了无可替代的、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重大贡献。

对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过去相对关注不够，认知态度也经历了由漠视曲解，避而少谈，到逐步直面历史，逐步客观公正对待的过程。国民党是抗战时期的执政党，它掌握当时的国家机器，能够配置全国资源和人力，调动几百万军队在正面战场抵抗日军的侵略。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民党军队牺牲少将以上的将军共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其抗战之惨烈程度可想而知。当然，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曾出现摇摆分化，副总裁汪精卫投降日本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国民党在抗战中还曾同室操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但总体看，国民党及其主政的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面对强敌没有妥协、没有屈服，始终在正面战场与敌人浴血奋战。八年抗战中，因作战不力或指挥不当，被蒋介石和各大战区处决的军长不下十几个、师长不下二十多个，所以台儿庄等诸多战役中流行“不死于阵前，即死于国法”的军中语。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国民党抗战的状态。

由此可说，正如共产党开辟和领导敌后根据地和敌后战场，为抗战胜利做出艰苦卓绝的重大贡献一样，国民党领导正面战场和大后方地区与敌人顽强搏斗，也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无法磨灭的重大贡献。从抗日战争的整体大局看，共产党提出和实施的一系列抗战方略，其所开辟和领导的敌后战场及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敌后占领区遍地开花，无疑具有全局性意义。而国民党作为执政党主持战时国民政府，其所领导的正面战场及大后方地区的抗敌斗争，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是自不待言。承认国民党抗战具有全局性意义，没有削弱、更无法否定共产党抗战的全局性作用。承认共产党抗战的具有全局性意义，也无法削弱和否认国民党抗战所占居的全局性主导地位。双方在整个抗战中做出的互为补充的全局性贡献，是通过各自的领导能力和抗战实绩实现的，是在既联合又独立、既协作又斗争的矛盾统一过程中完成的，不能相互取代，也不应彼此抹杀。不承认其中任何一方所发挥的重大作用，都有违历史史实，也有违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原则。

有了这样的基本认识，我们才能避免因党派之争和意识形态偏见，干扰史实选取而片面地撰写历史；才能对抗战史中诸多重大事件、重大战役、重要人物等，做出比较客观的描述和相对公允的评价。

三

书写抗战史，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对待和处理有关抗战的多种资料。

抗日战争从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算起，已过去78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三省算来，已长达84年。在这段相对漫长却消失不久并与今天紧密相连的岁月里，不同时期、不同主体以不同视角和不同方式，如报刊、书籍、日记、文稿、文件、档案、录音、影像资料等等，对抗战做了各式各样的描述、评说及研究。这些积累下来的资料时间跨度较长，数量庞大，有的颇有史料价值，有的较少参考意义，还有的甚至充斥偏见，混淆视听，需要做一番认真梳理辨析，披沙拣金的工作。

自日本在祖国大地燃起战火那一天起，各种反映日寇暴行和中华儿女英勇抗敌的著述就层出不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抗战结束后，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和台湾学者及有关人士撰写的抗战文章和抗战史著作。这些多写于上世纪后半叶的著述，客观上

已成为今天抗战史研究的一种背景和参照。可是，由于较长一段时间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受政治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两岸发表的不少抗战论著都存在明显偏弊，如台湾一些出版物说共产党在敌后战场是“游而不击”，而大陆一些出版物也说国民党抗战是“抗而不战”。如此罔顾事实的说法，都是不值一驳的。这类抗战著述的存在，与其说可让人作为某种参考，不如说提醒人从中吸取教训。我们今天研究抗战史，要认清此类著述感染了特殊时期的流行病菌，要增强自身抗病毒、抗感染的免疫力。

还有一类需要审慎对待的抗战史料，就是各种各样的抗战回忆录和访谈录。抗日战火熊熊燃起，投身抗战者及经历战火磨难者就不断写出有关回忆录和亲历记等。近二三十年来，由于抗战参与者多步入耄耋之年甚至期颐之年，许多报刊设“老兵讲抗战”或“抗战老兵口述历史”等栏目刊发大量访谈类作品，一些出版社也围绕抗战推出不少口述历史类或采访性纪实性书籍。这类著述由于具有当事人亲历、亲见和亲闻的特点，时常被当作珍贵史料予以重视。应该说，这类著述确有一部分讲述者经历独特且回忆和记叙严谨准确，很有史料价值和意义；但有些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有误、或因名誉夸耀之心作祟、或因采访记录者添枝加叶乃至杜撰编造，采纳使用时应特别小心谨慎。

最近读到一篇《老兵讲抗战》的文章，97岁高龄的解放军某部军政委刘增钰少将，1940年百团大战时在八路军129师任营长，采访者向他求证两个关于他抗敌的史实：“山西至今流传着‘刘营长赤脚进张净’的故事，我问他是否有这回事。他说：‘没有，那只是一种宣传，其实我打的是赛鱼车站。那次我们跑到张净车站的时候，别的部队已经把张净车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当时宣传人员找我问情况，我正好进城买鞋刚回来，因为下雨打仗我把鞋丢了，结果他们就用文学手法给加工一下，说是我打的张净车站，后来这个故事就流传开了。’我问他是否参与消灭过日军的一个运输大队。他说：‘没有。只有一次我们在平定西边的一条小路上埋了几个地雷，结果炸死日本鬼子运输队的一匹马，马肚子炸开个窟窿，马上的人没死跑了，这事宣传得也不对。’”（见《文艺报》2015年7月27日）我很敬佩刘增钰老人谈论自己抗战不掠美、不邀功的诚挚的态度，但这两则兼有张冠李戴和捕风捉影的抗战报道流传很广，并被载入当地抗战史的事实提醒我们，书写抗战史对于一些来自采访、口述或回忆类的资料，选择和使用时应注重与其他资料对照比较，进而确定其价值。

书写任何一段已经逝去的历史，主要应依据这段历史的原始资料。所谓“原始资料”，即指这段历史当事人当时记载、当年留存或刊印的资料。这一点对于撰写抗战史尤为重要。其原因不仅在于原始资料相对可靠，相对接近史实真相，更在于中国抗战力量组成结构的特殊性，以及抗战后中国历史进程的沧桑巨变。中国抗日力量的构成，主体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领导的两支部队。抗战前，共产党部队（红军和游击队）被执政的国民党视为“赤匪”而多次残酷围剿。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9月国共双方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转而承认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合法地位，并将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联合抗日。抗战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针锋相对推翻其在大陆的统治，建立新中国。正由于八年抗战是国共合作时期，此前和此后是双方反目阋墙年代，因而抗战当时对战事等等的记述，相对较少选择性过滤或有意无意地扭曲变形。如由苏中抗日根据地1945年7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有《关于抗战与团结的前途问题》一文，毛泽东在答美国合众社记者问时明确说：“我们拥护现在的中央政府，因为它坚持抗战的方针并领导抗战的行动”。（第69页）而由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署名的《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国防部史料局1946印行）一书，对八路军新四军参与的重要战役也多肯定性记载，并在所附“作战要图”上有明确标注。

基于抗战原始资料具有这种还原历史的功能和价值，我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就较为注意搜集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出版物。这本《故纸硝烟——抗战旧书藏考录》，从抗战发生背景、日本侵略战序幕、八年抗战历程、战时中国政治、战时中国军事、战时中国外交、战时中国经济、战时中国文化、日本对中国研究、中国对日本研究、抗战善后与恢复等11个方面，图文并茂地展示和评点抗战当事人当时写、当年印行的抗战旧书。我很庆幸自己能够与这些旧书结缘相伴，期望这些发黄发脆甚至破旧破损的文献资料，以当年白纸黑字、时代见证的身份，昭示中华民族在血腥抗战中的深重灾难和英勇伟绩，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和滔天罪行；同时也期盼这些旧籍能够为抗战研究者和关注抗战人士提供一点探寻真相的蛛丝马迹，早日读到更加全面更加公允的抗战史。

诗歌的超越气质与「接地气」

□普 冬

诗歌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和文化的高级形式，毫无疑义，高贵、超越的精神气质、精准的语言结构是它独特的禀赋和艺术特质。这种特质有别于其他文学形式乃至艺术形式——它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慰藉和愉悦妙不可言无可名状，亦是其他任何艺术形式不可替代的。新诗诞生以来，如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海子的《德令哈》等广泛流传的诗章，彰显了诗歌的高贵气质和无穷魅力。印证着荷尔德林“人类需要诗意地栖居在地球上”和爱之中。

她一闭上眼睛，夜就沙沙作响
她不能醒，不能动，不能惊动
身旁的婴儿。只有他才有痛哭的勇气

——小说家王小波的“勇气”也如此佐证着。

这些年，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接地气”。几经辗转扩散几乎成了诗歌的写作指南以及判别一个诗人的成熟度、“担当”意识强弱的标准，似乎一首诗提到了“柴米油盐、包谷红薯父亲伤口”便接了“地气，”（狠一点的再捎上几个脏字）便成熟了。君不见：把诗当做农耕经验炫技的，日常记忆流水账的，非虚构分行报告的，卖弄才识、巧舌如簧的痞子文学成篇累牍、津津乐道。有人问，诗呢？那让我们为之心动为之沉思为之欲罢不能、又让我们的内心归于宁静的诗呢？那火焰样燃烧、冰样冷峻、云样淡泊、尼采般喃喃自语的被我们奉为“诗”的东西呢，被我们视作灯塔、旗帜和理想之图腾的诗呢？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洪水泛滥的分行的平庸经验和非虚构叙述。

“接地气”与诗歌高贵超越的气质都不是什么新概念，前者是方法态度与技巧，后者则是禀赋（或者称之为“诗歌的dna?”）。如果换一种说法，“写实主义”、“浪漫主义”则分别是它们的过去式和表现形式：其实这也并非是对立的两个方面。正如当下的“中国梦”闪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谁又能否认她不立之于坚实的大地呢。

以见证“人类心灵史”为己任的诗歌过多强调“地气”是导致太多平庸叙述的诱因，让诗人放弃思想的磨砺，使得写诗变得更像是一份依懒熟捻技术的手艺活。诚然“接地气”是个很好的艺术主张，假若有一部书叫《诗歌生成》，总序一定是：莫忘初心——论诗歌之超越精神；此外还有299种诸如写作技巧、方法的铺陈。现在单拿“地气”说事并以此为号，未免以偏概全。诗歌需要紧贴大地呼吸的写作，更期待站在大地之上的诗人心灵的声音。我们摒弃了诗歌之禀赋以及人类心灵史的过去、将来和现在进行时的呈现，而是敷衍着大量物理意义上的非创造性、非经历分娩阵痛的非思想结晶，以及和我们的人格表现相对应的精神层面种种非诗因素，使生活经验和平庸叙述充斥并淹没了诗和作为诗最本质的即纯粹、幽思、精准与睿智等等钻石一样发光的那部分（当然还包括由此带来的无限思想空间）。而被称之为“诗人”的我们，会否像地面上逐食的鸡群，成了利益与经验主义的俘虏，这些与诗是没多少关系的。

我们的民族是聪明智慧有着灿烂文化传统的民族，也容易矫枉过正。如何欣赏或写作一首诗，是艺术包容能力的问题，亦检验着我们的哲思与审美能力。

愿我们的诗歌日见丰盈，隽永，并不忘初心。

《明人日记》接地气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 明江） 由作家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安谅小说集《明人日记》日前在上海举办了研讨活动。该书由100篇精彩纷呈、蕴意丰富的短小说组成，作品以小见大，充满现实感和艺术张力。

安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已发表作品约600万字，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话剧、音乐剧等均有涉猎。中国作协副主席叶辛表示，安谅的作品体裁丰富、才情充沛，有生活、有思考、接地气。《明人日记》精选于他多年来发表的以“明人”视角创作的数百篇作品，以现实为镜，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新意，艺术地提炼和展现，颇见匠心，可谓一幅当代风俗画。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郑宗培说，《明人日记》发挥了微型小说的艺术特色，将当下社会的生活百态生动形象地展现了出来。

专家学者谈到，安谅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并勤于写作，他善于在生活细节中捕捉心灵感触，于平淡惯常中寻求别致表达，每篇作品背后都显影出现实生活的印痕，使他的作品充满现实感，因其接地气而受到读者欢迎。

首届当代爱情诗大奖赛揭晓

本报讯（记者 刘秀娟） 8月15日，首届“中国·红豆绒杯”当代爱情诗大奖赛颁奖典礼在江苏无锡举行。湖南诗人宋志刚以《红豆，那颗磅礴的心跳》组诗获特等奖，胡云昌的《唐诗宋词里的红豆标本》、王太贵的《在一首诗里邂逅红豆》获一等奖。梁平、贾梦玮、龚学敏、王学芯、李自国等为获奖者颁奖。

“红豆”是古今诗人们吟唱爱情时钟爱的意象之一。据介绍，为贯通古典诗歌与现代新诗的审美表达，以“一颗红豆”唤醒现代人对纯美爱情和优美诗意的追求，促进当代爱情诗的创作，2014年7月，《星星》诗刊与红豆集团联合启动了这项赛事。本届大赛共收到作品4万余件，8000多位作者参赛，最终有63位参赛者获奖。

评论家张德明评价说，此次大赛以“红豆”为关键词，将中国诗人由来已久的“相思”之情和追怀之念深蕴其中，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情感方式和审美风范，也是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对话、接通的尝试。

『战火·青春』征歌活动在京颁奖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5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战火·青春”全国主题征歌活动在京举行颁奖仪式。17首获奖歌曲从362件应征作品中脱颖而出，并结集为活动同名专辑在仪式上首发。

今年3月，中国少先队事业发展中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太平洋影音公司共同发起了此次征歌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反映抗战故事、体现抗战精神的新创作歌曲。经评审，应忆航作词、王培林作曲的《为青春祭奠》获一等奖，《黄河小米》《星夜的海》获二等奖，《战场》《战火青春》《心愿》获三等奖，另有10首歌曲获优秀作品奖。反映抗战期间无私援助中国人民的法籍医生贝熙业事迹的歌曲《西山深处》获得特别奖。这些作品表达了对英雄先烈热血青春的眷念与赞颂，从中可以感受到创作者发自心底的深挚情怀和对责任使命的深刻思索。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活动推出一批与时代同步、为青年人传唱的主旋律歌曲，用人们喜欢的音乐语言讲述先辈们的英雄事迹，为弘扬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发挥积极作用。

当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官网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网上纪念馆”手机版同步上线，并推出了“平西抗日烽火”网上专题展。

《红缨》：传承不屈的民族精神

本报讯（记者 徐健） 献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儿童剧《红缨》将于8月26日作为第五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闭幕大戏在北京怀柔剧场首演。该剧由中国儿艺演出，廖向红任总导演，杜薇编剧，讲述了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的动人事迹。

杜薇介绍，该剧创作灵感源于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歌中塑造的小英雄王二小曾引起几代人的情感共鸣。如今用儿童剧手段重塑这一典型形象，是为了铭记先辈动人的英雄事迹，传承先辈不屈的民族精神。“我们用‘红缨’命名该剧，不仅因为红缨枪是王二小的武器，更因为红缨飘扬，扬起正义勇敢、和平自由、民族精魂。我们希望把这份精神和情怀传递给当代少年儿童。”

舞台表现方面，音乐与歌队的加入是该剧一大亮点，变化的音乐配合跌宕起伏的剧情发展，渲染出时而紧张时而活泼的氛围。廖向红表示，《红缨》以真实历史为基石，我们将通过该剧带孩子们回到70多年前抗日烽火的年代，引领当代少年儿童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潞城采风诗会在山西举行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由中共潞城市委宣传部、中国新文学学会乡土诗人分会、湖北省毛泽东诗词研究会主办的“太行雄风，潞城记忆·中国乡土诗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潞城采风诗会日前在山西潞城举行，共有70多位诗人参加。

潞城曾是八路军东渡黄河、挺进太行山、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总司令部所在地，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红色文化记忆。诗会期间，诗人们在潞城、武乡、黎城等地的革命旧址进行了红色文化采风，并把自己对抗日英烈的崇敬化为一首首雄浑激昂的诗歌作品。活动期间还举办了主题为“抗战诗歌精神的传承与再思考”的诗歌创作研讨会暨朗诵会。孙朝成、张永健、唐德亮、熊德彪、王学忠等与会者表示，抗战诗歌呼喊民众心声、推动历史前进，是鼓舞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号角。（别 蓉）

长诗《山河》在湖南芷江赠书

本报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长诗《山河》赠书活动8月10日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举行，数十位诗人、作家参加了此次活动。

长诗《山河》是“80后”战士诗人胡松夏创作出版的第八部文学作品。全诗由“从南湖出发”、“白山黑水”、“卢沟怒火”、“残雪”、“浴血奋战”等五章构成，借助诗性语言与宏大构架艺术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以军人的独特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了理性解读，气势恢弘，语言凝练，充满爱国激情和忧患意识。（欣 闻）

乐视《蒙面歌王》播放量突破2.5亿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1日，由乐视视频全网独播的大型音乐挑战类真人秀节目《蒙面歌王》在京举办全屏播放量破2.5亿庆功会。

自7月19日在乐视网播出以来，《蒙面歌王》凭精良的节目制作，迅速在综艺市场上赢得颇高的网络播放量，首播18小时播放量破2000万、8天播放量破亿。数据显示，截至8月11日，《蒙面歌王》前四期节目在乐视网的全屏播放量已突破2.5亿，再次刷新行业首季独播综艺节目的网播最高纪录。据介绍，在未来两年，乐视网将投入44亿元建设内容生态，其中仅购买综艺版权的费用就将达7.5亿。

《蒙面歌王》自开播起就对纯粹音乐保持一份敬畏。不少参加该节目的歌手表示，戴上面具唱歌让他们暂时忘记了被人熟知的标签，更加全身心地投入歌唱，这可以让音乐回归本真。

徐汝钊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钦州市文联原主席徐汝钊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5年7月29日在钦州逝世，享年76岁。

徐汝钊，笔名于峪。中共党员。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短篇小说集《离离乡间草》，中篇小说集《永远的河流》，长篇传记文学《刘永福》，话剧剧本《无名县奇人奇事》等。曾获首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